

【访谈】

编者按:2015年10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先生在无锡进行苏南社会建设课题的调研活动。在其调研间隙,本刊约请王君柏老师对景天魁先生做了专题访谈。这次专访的背景是景天魁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二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学并不是从清末民初引入西方社会学才开始的,而是有自己的起源,这“源”就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鉴于这一论断关涉到中国社会学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刊试图通过访谈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在访谈中,景天魁先生又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的重要观点。现发表这次访谈的整理稿,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访谈

景天魁¹, 王君柏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6)01-0005-09

一、要认真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地位问题

王君柏(以下简称王):景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一直以来都关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从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第一次年会开始,一直到去年的广州会议,您常常出现在会议上,并且每次都有精辟的大会发言。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请您谈谈您对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景天魁(以下简称景):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理解吧,或者说我的一些思考。我有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谈不上研究,反正这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思考的。多年来,对所谓中国社会思想史,还有中国社会学史,它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一向采取的是从众的态度。因为在我进入社会学界之前,这些学科的含义,好像

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多深究。刚才你提到1999年2月在南开大学,咱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研究或教学的学术研讨会。我在那次会上,就讲了我当时的思考重点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广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区别。当时考虑这个问题,还是希望能够明确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特点,因为过去搞史学的,像侯外庐先生他们,都是统称“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是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当然也包括社会思想史。那么怎么从中将社会思想史区别出来,这就要明确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特点。

王:我对您当时的发言印象比较深,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还引用过,您当时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三条主线、六个侧重”的思路,三条主线是群己、家国、治乱,六个侧重是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侧重社会生活,在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侧重社会关系,在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中侧重下层生活,在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中侧重群体生活,其它

[收稿日期] 2015-11-10

[作者简介] 景天魁(1943—),男,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顾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哲学、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

王君柏(1972—),男,湖南石门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

的几个侧重我就有点模糊了。

景：是这样的。当时，我觉得从社会学的视角，应该关注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它就不可能是人类的全部思想，而应该是以群体、家国、治乱为主体内容的思想。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我就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应该有所侧重——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应该侧重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要侧重对社会关系的考察；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侧重对下层社会的考察；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个关系中应该侧重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在伦理关系和交往关系中侧重对交往关系的考察。^[1]当时的用意还是希望社会思想史不要太宽泛，不要包罗太广，它应该有独立性，而要有独立性就需要确定一个范围。

王：群己、家国和治乱这三个方面能否稍微引申一点，就是群己到底是指我们中国特定的群体，比如像家族、家庭或者其它地方社会群体，比如行会之类。而已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个体，还是什么？我看费孝通、潘光旦他们做了很多研究，专门讲这个“己”的问题，有很多较成系统的阐述，潘光旦认为，就是他把自己这个人做好，那么自然而然地实际上就把这个社会做好了，他没有把群和己分开。所以费孝通说，他那一代就差不多把群和己分开了，说他们做一个事情需要别人给他们鼓励，是要看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潘光旦那一代呢，他说他不在于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好。这是他们对群己的一些理解。

景：他们的这些研究，也是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延续。我觉得群己关系也好，家国关系也好，治与乱也好，当时提出这三个核心内容，还是从中国思想史应该包含哪些基本内容来考虑的。我觉得真正要搞清楚这三个问题，当然也许不只这三个问题，还是要考虑一下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从1999年到今年，已经16年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地位，并没有像最初所希望的那样确立起来，反而有点被边缘化的感觉，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王：确实，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既要懂社会学，又要懂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导致要想透彻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困难比较大。

景：本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为什么却有些边缘化了呢？这里面肯定有

问题。治中国社会思想史确实比较艰难，必须懂点儿古文，以经学、史学、乃至考古学、民俗学等为基础，要掌握这些学问当然是很难的。但是这种困难不足以解释这个学科为什么会边缘化。因为，治中国社会思想史固然很难，那么治西方社会思想史就容易吗？那也要下很大功夫，得学习外文，学西方历史文化，我们中国人从小学中学到研究生，算算在英文学习上要花多少时间，如果拿出同样的时间来学习中国古代汉语，那也能学得不错，所以这个难度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对不对？如果它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再难也有人去攻，去下功夫的。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继续思考。从1999年到2002年，又三年过去了，在南开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讨论会。

王：是的，2002年的会议我也参加了，我记得您在会上提出过一个观点，大意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基础学科。

景：对，我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说这个话，表明我已经在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定义和定位了。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意思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分支学科。我的这个思考，就不只是怎么从中国思想史里面把社会思想史独立出来，而是进入到了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了。因为，仅仅从中国思想史中把社会思想史独立出来，还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思想史边缘化的问题，必须把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搞清楚，才能解决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地位问题。

但当时我虽然肯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但还没有很明确地讲出这个基础和社会学具体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复杂、很困难。此后，我对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定义和定位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但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上，而这个研究，从学术层次上来说属于社会政策。2010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出版了《福利社会学》一书，这本书表示了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跳出社会政策这个框框，因为大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都属于社会政策的层面，我们搞个《福利社会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试图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从政策研究拉回到社会学的体系里面，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建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在这上

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关于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以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多年都荒疏了,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对我个人来讲,当时这也是身不由己的安排,但是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和定位问题,其实在我脑子里还在一直思考着或者说苦恼着。

王:您那段时间还是多次参加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会议,按照我的理解,还是在不断进行这方面的思考,那么从什么时候才又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这个领域来呢?

景:前面讲的研究主要是2010年之前,到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这一年3月份,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先后召开讨论会,这两次会不约而同都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发展历程。这么一个主题,又都邀请我在会上做主旨演讲,这就激发我来思考社会学的发展问题。我就在这两次会上连续地讲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些看法。这两次演讲稿,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2],该文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首先就是触及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应该研究什么、怎么定义、怎么定位,这一系列问题。当时我讲的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古今问题。能不能说中国社会学只是从严复译作《群学肄言》一书才开始?能不能说中国社会学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提出来了。除了古今问题,再一个就是中西问题。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社会学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广和应用吗?现在回顾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关系,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的关系,再进一步思考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核心内容

王:您上述这些宏观的、总体性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研究领域,需要有一些这样高屋建瓴的工作,才能把框架搭起来。

景:思考过这些后,最终归结到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定义和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证明,假设不搞清楚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对群己、家国、治乱的研究,你若还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文献资料,这样搞来搞去,还是不可能适切地研究中国

社会,还是不能从中国自己的学术脉络中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我们过去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拿出中国的一些思想资料,然后用西方的一些概念去套,看看哪些资料用西方的概念套得上,哪些套不上,就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思想史。这样的研究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地位越做越低,也就越来越边缘化了。

王:确实,这么分析下来,也就找到了中国社会思想史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用西方的筛子来筛选我们的材料,这个问题太大了。实际上港台地区也倡导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学中国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传统概念来对现象进行解释。

景:对,我们一定要跳出来,说起来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根本问题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是什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或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有没有一个主轴,有没有一个核心内容。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从诸子百家到后来,谁说过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史料。用西方的概念,比如社会化、社会分层、社会互动等等来套,看看这里面什么可以套得上。中国社会思想史本身好像什么都不是。

王: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社会思想史应该是社会学一个基础学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前提,大家站在中国这个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资料。

景:对。我思考了十几年,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就是在中国社会史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滋养下,中国社会学是怎么从中国社会思想中起源和发展的。这就需要最起码明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如果仍然像过去那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从严复以后才有的,那么就只能把严复以前直到荀子这两千多年的社会思想全都排斥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不能纳入学科史。

王:这个问题,费孝通,还有拉德克利夫·布朗,说过社会学的真正鼻祖是在中国,那就是荀子。^[3]荀子其实是很注重“群”这个概念的,布朗说群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思想。我也研究了荀子的这个思想,我觉得他讲的也确实是社会学。

景:所以我们还是要下功夫,把这一点好好讨论清楚。我们古代仅仅就是有个社会思想,还是已

经有了社会学了？难道不论社会思想多么丰富，就是都称不上社会学？中国社会那么复杂，中国学术那么源远流长，难道产生不了社会学？这还是把孔德提出的这个社会学名称当作是一个标准、一个框框、一个独占权。在此之前，不论你是什么都不得称为“学”？搞清楚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社会学，特别关键。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在理论上明确学科的界限到底应该怎么划。一种常见的观点，就是认为不光社会学，全部社会科学，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直到十八世纪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才有了学科化的问题。其实这个说法，首先在西方就不是太合适，不能讲十八世纪之前西方都没有学科，老早就出现学科了，不过学科的形态、成熟程度不同而已。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了政治学，只能说那时候的政治学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不能说没有。亚里士多德还创立了（西方）逻辑学、（西方）伦理学等等，所以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百科”这不就是承认早就有学科了吗？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说在十八世纪之前就没有什么学科。确实，在十八、十九世纪出现了很多学科，但不等于说学科就只能在那个时候出现，也不能说，社会学只有 1838 年才能出现在欧洲，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学术脉络中，都不可能出现社会学，哪怕是不同形态的、“早熟的”社会学都不可能出现，这不就是露骨的西方中心主义吗！

这里还涉及到关于“学”的用法问题。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我们中国古代的所谓“学”，用法不同。您好像看过我的那篇《中国社会学源流辨》？

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的那篇？我认真看过了。您提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能采取“西方问题+中国证据”的模式，这是一个深刻的认识，也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有很大的关系。

景：我觉得特别需要明确一点，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讲的“学”，与西方讲的含义是有区别的。我们古代对学科有自己的理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学，我们的学科放在学派里面，西方呢，是学派放在学科里面。这当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未必尽然。西方经济学这个学科里面分了很多学派；社会学里面也分了很多学派。西方是这样的，学科是个大概念，学派是个小概念。我们中国古代，学派是个大概念，学科是个小概念。比如儒家学说，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学科，像孔

子讲的“六艺”，那不就相当于六个学科吗？墨家也是如此，学派里面分的学科就更多了。墨子甚至提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程技术学科，而且墨学中的工程技术是很专门的。可见，我们是学派里面分学科，西方是学科里面分学派。难道能说只许西方学科里面分学派，就不许中国学派里面分学科？或者说我们中国学派里分的学科就不是学科？这个就太有点以西方为主臬了，中国的做法就全不算数。应该承认，西方在学科里面分学派，中国在学派里面分学科，只是分法不同而已嘛。

王：其实西方那个时候也并没有都分得那么清。像马克思还有韦伯，他们的思想就包含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各个学科，再往前看，像休谟、卢梭这样的人，他们的学科界限也不那么清楚，涵盖很广，包含多个学科，并没有把学科分得那么细。好像只有我们现在才把学科分得这么细，各学科之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畛域分明。

景：要肯定，我们中国不是没有学科，而是分法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划分学科的目的和效果也与西方不一样。比方说，荀子的群学，他不把他的群学单拉出来，与其他的学科都割裂开，他一定要把多个学科综合在一起，他的社会学与他的法学、政治学等等，都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就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总体性把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我们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有很大的关系。孔子周游列国，给别人讲学的时候，不能说我现在开始讲教育学，不爱听的可以走；我又开始讲法学了……他不会是这样的，他肯定必须把各种学科综合起来讲，提出一个治国方略，处事方略。然后针对当时的复杂问题，难办的问题，指出这个怎么解决，那个怎么解决。这样才有听众，治国理政者才觉得有用。我们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一个高度综合的社会，家国同构、政社不分，慢说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分为代数、几何等等，我们一个《周髀算经》里边什么都有了，一部《齐民要术》包括了许多门技术。一个“鸡兔问题”被整体地提出来，求解一个问题要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是中国学术的一种形态，是中国学问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你能说我们中国这一套不是科学、不先进、不正宗？我国在战国时代就修筑了都江堰、郑国渠这样的特大水利工程，当时运用的科学技术，不知比西方的什么水利学、水文学、测绘学、土木工程学早了多少年！

王：我们就是注重经世致用，注重以问题为中心，不是为学术而学术。

景：对，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它不是把学科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问题是综合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学问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发展下来的。从中国学术的这一特点看，你就不好说荀子那里就一定没有社会学，或者他的群学就算不上社会学，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只能说荀子的群学不像西方的学科那样边界清晰（其实西方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也未见得有多么清晰），但是群学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学科这个界限问题，我们不应该就只认可西方的标准，不顾中国几千年来学术特点，完全拿西方的标志来衡量中国，从而得出中国没有社会学的结论，这个我觉得太武断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时间界限问题。多少年来流行的说法，都只是认定中国社会学史从严复译书开始算起，认为那是中国社会学的开端，至今也就一百多年吧？

王：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大概是1897年开始翻译，1898年陆续在报纸上刊登，后来全部放到一起出版，时间应该是1903年，书名也才正式定为《群学肄言》。

景：这样算，也将近一百二十年了。那么一百多年来，学术界都是说1838年孔德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在我们脑子里印象太深刻了。其实他只是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名称，可是，现在一说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创立了社会学，却就成了天方夜谭。中国怎么可能早人家两千年就创立这个学科，中国人有那么神奇吗？中外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王：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就开始认为西方的就是科学的，就是真理，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也需要西方人肯定了，自己才开始有点信心，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他说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家是我们的司马迁，这是外国人说的，外国的名家说的，我们听起来感觉就能接受。所以，还是这样一个以西方为圭臬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学术界还是比较普遍的。

景：我觉得费老晚年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西方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是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中国老祖宗呢，自古以来就是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既然这样的话，可以说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构成了我们中国学术极为丰富的内容。《论语》也好，孟子、荀子也好，大量讲

的就是社会，人和社会，社会治理等等。如果说古希腊在宇宙观、自然观方面做出的贡献比较大，那么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创立某些学科，也不足为奇。

王：所以，潘光旦对中西方的社会思想作了一个总结，他的看法是最终形成了一个新人文史观。这个新人文史观就是讲的中国这个人文传统最后会统摄所有的人文思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文传统的一种延续。

景：我们回过头看，荀子在战国末期创立群学，就当时来说，也是有社会实践基础的，那时的社会关系已经非常复杂，人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创立群学，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样来看，我觉得虽然荀子创立的社会学或者群学，与后来我们见到的社会学在形态上有所区别，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荀子群学里面很多概念、很多思想，与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社会学是很契合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群己关系问题，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研究，有些概念可能西方提得比较明确，而我们有些概念可能在内容方面更加丰富和深刻。群己、公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讲这个“己”，和西方人讲的个人、自我，就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显然我们这个“己”的概念内容更加丰富。

王：对，中国讲的“己”，最终落到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群己自然融为一体的路径，群和己融为一体，也就是西方讲的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没有对立。

景：我们讲这个“己”，既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是家庭，当你走出国门，这个己方就是中国，它不像西方那个个人概念那么固定。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圈”，像费老讲的，是不断往外推的差序格局。所以我们这个群己关系要复杂得多。我们这些思想、概念含义要丰满得多。不能说我们这个就不是社会学，只有西方那个是社会学，这显然没道理呀。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是

中国社会学起源和发展史

王：景老师是否可以说，把这几个层次的问题讲清楚了，就自然可以进一步确定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位问题了。

景：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问题搞清楚了，就可以确立起一个观点：什么叫中国社会思想史？它的主轴是研究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的。这样，中国社会思想史就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了！当然也

有区别,这我们后面再谈。首先要看到,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可能被边缘化了。因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了以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原来习以为常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原来认为中国社会学史就是西方社会学传播到中国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那么中国社会学史老早就开始了。不是从严复译书才开始的,也不是从孔德发明“社会学”的名称才开始的。这样一来,比如说我们要讲清楚现实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追溯它的历史演变。因为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嘛,在这个时候人们就会认识到,假如我不学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我就搞不清楚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可能被边缘化了。如果像原来那样,中国社会学史只是西方社会学的传播史,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边缘化问题当然就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中西社会学的关系,也就是我说的那个“源流问题”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一旦把这个关系搞明白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会边缘化了。否则的话,社会学就是人家西方社会学,那你中国社会思想史再说重要都没用。它就难免是可有可无,可学可不学的。但是,如果中国社会学不是西方社会学的翻版,而是有我们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你要理解社会学这些概念,就必须追溯我们历史以来的家国关系是怎么演变的,我们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是怎么演变的,这样才能理解的话,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没法边缘化了。

但是我说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并不是说二者完全等同。为什么呢?这就是“社会思想”和“社会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首先一点,从层次上来说,社会思想包含的层次很多。社会思想里面包括的一层是社会哲学思想,第二层是社会思想,第三层是社会管理、治理等技术和实用方面的思想,这些都是社会思想。社会学史,只是这个学科的历史,是社会学这一层的发展历史。它不应该包括社会哲学,也不包括工程技术性质的社会管理。

王:就是说社会学史它就是一个学科发展史,可以这样说吗?

景:社会学,在它的上面有社会哲学,那应该属于哲学,而不属于社会学史,但社会哲学思想也是社会思想。社会管理技术思想也是社会思想,但那也不是社会学。所以,中国社会思想史包含的层次应该比中国社会学史包含的层次要多,这是它们的

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从时间跨度方面来说,中国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学又有区别,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史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那么在荀子之前,中国还有好长时间的社会思想史,夏商周三代呀,孔子、老子、墨子都比荀子要早很多年。荀子群学也是之前好长时间历史积淀的结果。所以,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涵盖的历史跨度应该比中国社会学史还要久远。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了,是一致在哪里呢?中国社会思想史应该以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为主轴,但不限于中国社会学史。这样的话,也就和我2002年的那个观点一致起来了。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涵盖更广泛,时间跨度更长。这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一致和区别。把这两个关系搞清楚了,我觉得我们才能够讨论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如果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我们中国社会学将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费老讲的从中国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学科,这都成问题。

我们还要以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着眼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这样一个脉络下来,不论从内容的丰富性也好,从学科地位也好,从学科作用也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我们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就解决了。它作为一个能够回答中国崛起中的社会问题的学科,当然就是中国学术昌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组成部分,这样,它在世界社会学中的地位也就确立起来了。不然的话,西方人会说:“你这个学科都是学的我们的,你那个概念都是我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说的,你那套东西无非都是对我们的牙牙学语罢了”,那你不可能有什么话语权。

王:对,真正有民族性的东西才会成为一个国际上的中国学派,不然的话,永远就是西方学派的一个应用。

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国际会议上,当西方学者听到中国学者运用几个舶来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人家会怎么想?就如同我们听外国人来讲《周易》,讲“道”这样的概念,难免觉得不解就里。同样,我们搬用西方的理论,搬用得对不对就难说了,很难想象英法德美这些国家的学者会承认我们对西方理论能比他们理解得更好。所以,你什么时候都是小学生,因为你们没有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学科历史和学术传统。

王:对,就是没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费孝通晚

年始终强调的也是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这么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方，文明一直延续着，一定有很多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现在的社会学，应该将这些经验教训整理出来。

景：当然我们不是牵强地非要把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追溯得很远，我们还是应该有根据嘛，应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嘛。但是，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传统，这个学科的地位是很难讲的！中国社会学只要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用的概念都是人家西方的，就很难自称是“中国社会学”。当然，不是说人家西方的东西都不好，我们都不能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都用人家的东西，这个学科可以说就永远没有前途。

王：我看到费老在晚年的讲话，就对套用西方概念深恶痛绝，反复在讲，说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家里，抄别人的概念，你写了文章，得了学位，你文章发得再多，这恐怕都不能证明你有水平，也都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没有任何关系。

景：是啊！所以，需要我们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和定位，要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是什么关系，要搞清楚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是什么关系。我们费这么大的劲来论证中国古代是有社会学的，那么现代的社会学和古代的社会学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决定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前途。

四、增强文化自觉是发展 中国社会学的必要前提

王：讲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景老师能不能探讨一下，因为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费孝通晚年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社会学学科，始终讲的是社会学的知识，但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自己是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您刚才也讲了，中国有一个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用”，应该是用于国家、社会，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有为天下、为国家的发展而思考，为它尽一番力的这么一个动力，而所有这些应该具有一个前提，就是知识分子应该跳出自己的饭碗意识，不是为了我自己的饭碗问题，我去发文章。我看了费孝通晚年在《南方周末》的谈话，大概是2004年，还是稍微早一点的时候，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庸俗，为什么庸俗呢，因为没有跳出这个饭碗意识，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去思考问题，这样就势必导致你无

法真正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你没有为天下为国家考虑啊，所以他说，不庸俗的人极少，他提到的比如顾炎武、丁文江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人，他说他们真正是跳出来了。那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研究思想史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我想，比如说这种士大夫阶层的为国家为社会而奋斗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中还能起作用，那么这个问题，不知道景老师怎么看？

景：我记得，费老有一次就讲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人批评他，意思就说，他们那个社区学派，在那里搞实地调查，不过是讲了些具体的事情，而在学院派的人看来，你那不是纯学术。对此，费先生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反驳了，意思是说，所谓的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是不足取的。费老自年轻的时候就坚持，中国的学术就是要经世致用，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富强问题的，而不是在那儿无病呻吟，不是躲在象牙塔里自己玩玩所谓概念，对社会没有用处，那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费老终其一生，都是一以贯之，直到晚年他领导恢复重建社会学，他是志在富民，他认为中国社会学是要为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服务的，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的，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问题。费老所认定的真学问，就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他反复讲过这个意思。否则的话，你说了半天，什么用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回答不了，那能叫学问吗？

那么，怎么做真学问，那就要本着高度的使命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费老有非常强的使命感，无论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都是肩负着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责任的。他有挨整的时候，也有风光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识始终很强，支持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不可能把学术只是当成个人的利益，当作饭碗来看待。这个坚持，也不只是费老，是代代相传的中国学术传统。

王：我们现在主张恢复传统，但我觉得这个传统应该是可恢复的东西，我不太同意一天到晚让小孩读经，穿个汉服搞个什么仪式，我觉得这些可能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继承那种真正的精神，这个精神就包括刚才讲的，精英阶层的责任意识。我曾经和微软的一个员工聊天，他说，我们老板一天到晚比我们辛苦多了，他们上班的时间一天是十六个小时，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感啊，什么事情他们都要负责的，我们普通员工是不需要负责的。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国外是精英把这个社会责任承担起来了。中国有的老板，一

天到晚花天酒地,把责任推给底层了。我们要使这些精英们承担起责任。这虽然只是他们企业界的一个说法,也符合我们中国思想的传统,那就是,精英们确实要把责任承担起来。

景: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这个,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都应该有此情怀。我们研究社会学的,更是要牢记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术,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结合起来,不要去追求那种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学问。特别是我们现在做学问的物质条件,都比过去好多了,吃不愁穿不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要去受那些世俗的物质利益之类的诱惑。

王:不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受穷,但是知识分子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追求钱。

景:对啊,我们要做社会中敢于担当的人,最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任的人,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才会受到尊重。

王:这还是一个中国传统的问题,我始终认为这种传统,一定是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作用的那种传统,它才值得继承。

景:结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把这种精神,渗透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内容里面。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不是要背下来《论语》里面怎么说的,《道德经》里怎么说的,当然这个也需要了解,但最重要的是要学到中国学术的这个根本、这个灵魂。中国社会思想史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它的学科地位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相信现在和今后一代一代年轻人,他们是会认同这种精神的,也会继承这种精神的。

王:尤其是当中国进一步强大起来以后,这个自信可能还是会越来越强的。

景:对,尤其是社会学。我们中国的社会,在全世界来说,不仅是最大,也是最复杂、历史最悠久的。我们的社会学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一定要以我们中国这个宝贵的历史资源为基础,这样,我们这个学科,在世界上就可以受尊重了。

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很广阔的。我们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传播点历史知识,传播知识只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手段,真正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学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接受这种熏陶,确立起一种好的人生理想和处事的态度行为等等,那这个学科所发挥

的作用就大了。中国社会思想史从内容到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不能越走越窄,那样就会边缘化,所以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是不是?

我们真正把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做好,把它真正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础,确实放到这个位置上去,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了解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了解它是内容非常丰富广阔的一个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地位自然也就确立起来了。

我们也不要刻意去追问“国学热”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可能是有所偏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这个学科建设好。我认为,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真正看作并且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以此为主轴,把它的内容丰富起来、系统起来、凝练起来,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些中国精神、中国学术基因的话,就完全可以吸引很多学生来选这门学科。有很多学生来选这门课,这门课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所以,2014年我在南开大学演讲的时候,还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社会学教学,不要一开始就讲社会学概论,应该从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讲起。先讲中国社会学的,沿着战国时期以来两千多年的丰富脉络,以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为主轴,结合着中国社会的演变,然后讲到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的引入。

王:然后再讲西方社会学。

景:对,然后再讲西方社会学,中西社会学的会通,以及后来的发展。这样,在学生的观念中,就有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地位了,他很自然地就会考虑,西方社会学哪一条是适合中国实际的,哪一条是普遍有效的,哪一条只是适合西方的情境,因而是特殊的。现在呢,一上来就先讲社会学概论,讲的其实都是西方社会学的东西,先入为主地确定了它的“公认的”、“正统的”近乎真理或者是基本原理的地位,这就等于告诉学生,社会学就是这个,不是别的,只有这个才叫社会学(其实是西方社会学),其他的都不是社会学。然后再去讲中国社会思想史,那学生就觉得,这个不符合“社会学”,与人家西方的“标准”说法不一样,所以就称不上社会学。

我在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的会议上都讲过,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和老一辈社会学者的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我们对中国的学术传统或者说对国学没有根底。没有根底,见了西方社会学也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也就谈不到鉴别力。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以及他们那一代社会学家,人家

从小就学得国学,对中国学术有修养、有根基,人家就有比较、有鉴别,知道中西社会学的区别是什么,所以他们能有文化自觉,觉悟到社会学要“中国化”,能够理性自觉地看待中国社会,认为应该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我们一开始学的就是西方社会学,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社会学的源流是什么,要建立起文化自觉,从何谈起?

王:所以确定一个主体立场很重要。

景:我为什么主张要从中国社会思想史讲起,就是这个原因。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就是先学习中国的东西,然后再出国留学,学了西方社会学,所以他们能够真正融会贯通。换言之,就是先建立起对中国学问的认同,就不会轻易相信“凡是不符合西方那一套的,都不是社会学”这样的霸道逻辑。

王:所以费老晚年才反复地讲,需要文化自觉。

景:费老为什么强调文化自觉,为什么他讲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他用词是非常谨慎的,他说是“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4],实质上他思考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才称得上中国社会学。不然的话,他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怎么讲了好多自先秦诸子以来,宋代理学、陆王心学等等传统上认为是哲学史、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内容?这些怎么能进入社会学的学科范畴呢?据我体会,费老实际上是告诫我们,不要再去拿西方社会学的界限来框中国社会学,先秦诸子那里有社会学、宋明理学里面有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里面有社会学,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宝贵学术资源,我们要

扩展眼界,不要自我束缚,我体会他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用意。所以,我的理解,费老讲的不仅仅是个学科界限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学的最根本问题。这也是我的那篇论文,以及此前的两次演讲,题目叫做“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的缘故。

王:费老那篇文章我反复阅读过,信息量很大,是大思维,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思考,是他论述文化自觉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

景:非常有意思!我看了多少遍,我就琢磨费老讲的其实不仅仅是学科界限,不仅是怎么扩大学科界限。费老实际上是讲的中国社会学的根本、根源、基因,是被流行的《社会学概论》忽略了的人文性的内容,天人之际、群己之别、将心比心,……这是回答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费老晚年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是个根本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陆学艺 王处辉. 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总序)[M]. 南京: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 [2] 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J]. 学术界, 2014,(9).
- [3] 费孝通. 从实求知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32.
- [4]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M]//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47-174.

(责任编辑:谢光前)

A Study 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hinese Sociology

JING Tian-kui, WANG Jun-bai

Editor's Not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October, 2015, Jing Tian-kui, a commissione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nducted a surve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Jiangsu in Wuxi. During the research, Wang Jun-bai was invited to carry out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Jing Tian-kui. The background of this interview is Jing's article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Sociology, published on the second issue of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in 2015, in which he claimed that Chinese sociology has its own origin instead of starting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western sociology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eyes of J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sociology is nothing but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s of Chinese sociology represented by Xunzi and his followers. Considering that, this thesis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 thoughts and Chinese sociology but also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sociology and western sociology, and this journal tries to provide a clear picture through this interview. During this interview, Jing put forward another significant viewpoint that the principal axi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 thoughts should b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sociology. The follow-up of this interview was published here, in the hope of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